

□ 文学研究

#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观念的流变

周 航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 重庆 408100)

[摘 要] 文章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进行了整体性的阐述,也即对1989年以来不同时期观念流变的过程,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由来和争锋,也包括“盘峰论争”之后多元走向的格局进行了大致溯源式的探析。诗歌观念流变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断裂、消沉与再生长的初期,发育、形成与分化的中后期,冲突与走向多元的新世纪。

[关键词] 90年代以来;诗歌观念;“盘峰论争”;流变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5)06-0068-09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经提到“文化话语的断裂”的问题,这似乎很切合中国从1989年后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段的实情。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说:“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断裂产生了普遍的、社会难以应付(个人也是同样)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其实分别出现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末期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几个历史时段。他认为,面对这种情况,将会出现一个关键性问题:“现代社会中文化本身的聚合力问题,以及文化(而不是宗教)能否提供一个广泛的或超验的终极意义,甚或日常生活的满足。”这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诗歌界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知识分子写作”观念还没有正式确立之前,这种“聚合力”就没有形成。反而是,“低俗文化的蔓延大有颠覆严肃文化之势;而畅言无忌的亚文化向社会各重要阶层提供了种种自我中心的模式。”这正可以用来解释为何诸如“汪真诗歌现象”在当时流行的原因,还有后来的网络诗歌恶搞现象。不过,当我们来考察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时候,尤其是在思考刚刚开始时的那种断裂、消沉与再生长,以及后来的发展与分化的整个过程的时候,如果从诗歌本身出发,我们会十分赞同丹尼尔·贝尔另外担忧的一个问题:“潜在问题不是这些显见的社会学发展,而正是让现有文化失去内聚力的话语,即语言,以及语言表达经验的能力的断裂。”<sup>[1]</sup>借鉴他的这些分析来考察90年以来诗歌的历史,将会大有裨益。

## 一、断裂、消沉与再生长的初期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诗歌经历了一个断裂、消沉与再生长的时期。但是,我们又可以把90年代初期看作是一个凝聚点,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界限十分明显的年代划分。它的模糊性体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写作”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之中。由于1989年后诗歌精神的集体暗哑,相对而言,诗歌从1989年到90年代初出现了某种真空的局面。随着时代语境的逐渐好转,诗歌中的知识分子性又逐渐复苏,以致此时期不同的诗歌观念能够体现出某种共同的特征而不至于产生明显的分化表征。或者说,真正具有知识分子性的不同诗歌观念,在此一时期都暗中共同面向时代而酝酿抗争的酵母,而在诗歌内部则表现出暂时的面向不同分歧的妥协。这就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诗歌的再生长提供了一个以供孕育的温床,各自观念的顺利滋生与生长,也就为后来的分化打下基础与提供了某种可能。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受制于主流、专业的批评家,还有官方文坛话语,诗人的观念往往体现在自身的创作中。不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第三代诗人的出现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初兴,自我表达观念的欲望渐趋强烈,“86现代诗群体大展”就是最直接的体现。诗派林立,自然各自观念需

[收稿日期]2015-07-28

[作者简介]周航,男,湖北咸宁人。博士,博士后,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

要得到充分、适时的表达，比如“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等。众所周知，1989年出现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大断裂，诗歌界也是如此。思想的断裂，让诗歌界也突然沉寂起来，从而进入一个相对的消沉期。

在经历了短暂的停歇后，20世纪90年代初诗人在沉痛之余难以抑制思想的喷发，他们不满明显滞后的诗歌批评现状，又鉴于先锋诗歌存在一定的不可解性，终于忍不住自己跳出来说话。这就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一道独特风景，而且给整个20世纪90年代诗歌观念的发展以及后来发生分化的趋向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诗人自己说出来的话，将会更有分量，而且是直接从诗歌内部传出来的声音，与外部的批评相较，诗人的观念及其自觉将之运用到写作中，这对诗坛造成的冲击将会更大。

细作考察，我们会发现从198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几年间，诗歌观念的流变还是相当明显的。它既表现在具体创作现象上，也表现在新的诗歌观念的命名上，还表现在对诗歌本身合法性与新诗源头合理性的探究上。这种“怀疑”或“质疑”的观念贯穿了20世纪90年代的始终，并以不同论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还引发了新世纪后关于新诗标准与传统的讨论。这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诗歌观念一开始就是复杂的，但是这种复杂之中有突出的亮点，即“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凸显。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考察20世纪90年代初期诗歌观念的流变，最后以“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凸显作结。

第一，具体创作现象所表现出来的观念流变。

家园啊

游子从远方踉跄回来了

能否修复 他本来面目

——节选自曹宇翔《家园》（1989年《星星》新诗大奖赛获奖诗作）

自海子1989年卧轨自杀后，他的“太阳”便在中国出现暂时沉寂后照亮了“五月的麦地”。海子突然让中国诗歌在经历第三代诗歌后现代式的喧闹与“89年”的震惊后觉得以前有些东西不好玩了。于是在诗歌旅途中走得有点“远”的“游子”们突然想到了“家园”与“泥土”。海子的悲剧与现实的悲剧合二为一成为突降而来的诗歌语境，怀念海子与疲惫之后的回乡就成为不少诗人的姿态。“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泥土的光明与黑暗，温情与严酷化作他生命的本质，化作他出类拔萃、简约、流畅又铿锵的诗歌语言，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哦，中国广大贫瘠的乡村有福了！”<sup>[2]</sup>这种观念在先锋诗歌暂时缺阵之际，一时成为流行的趋势而左右了诗坛。于是，新乡土诗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焦点。

从1989年开始到1991年，包括主流诗刊《诗刊》《星星》《诗歌报月刊》在内的多数刊物大量发表新乡土诗并配发评论与讨论文章，一时蔚为壮观。此时的新乡土诗俨然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并形成北京诗人群、四川诗人群、上海诗人群、南京诗人群，尤见突出甚至是后来者居上的安徽诗人群，代表诗人有陈先发、沈天鸿、罗巴、蓝角、祝凤鸣等。甚至有人在后来如此概括这股潮流：“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北岛等人的现代怀疑精神，到东方古典主义形而上的哲学体认和技术迷恋，再到第三代诗歌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空杂耍，以及经典性写作的文本建构等等之后，由对欧美现代哲学诗艺的浸染，再到中国乡土立场的回归，这样一个完整的艺术流程。”<sup>[3]</sup>有论者把这种观念与写作潮流说成是“游子”意识在起作用，并对其定性：“新乡土诗既不同于现代派的诗，又不同于旧乡土诗，但其创作队伍却是来自现代派诗人与乡土诗人，是一部分现代派诗人空间化（或曰乡土化）与一部分乡土诗人时间化（或曰现代化）的结果，由此两部分集合而成。这也反映了在中西文化撞击中必然发生的诗歌流派之间互融合流的趋向。”<sup>[4]</sup>这种分析很是精当，也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这种过于冷静与无关痛痒的分析忽略了一个时代与政治的深层内因，即诗人们在80年代无限高涨的抒情氛围中被突然打断后的那一分悲情与无奈感。如此之下，充满挫折感的诗人们才突然掉头，转向一种原乡意义上的土地、家园，以寻求一种受伤后的心灵安慰与精神的暂时避难。究其实，新乡土诗的流行其原因很明显是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突然中断而导致的一种原乡悲情，加上现实的压力导致诗人去寻找土地以求栖身。

新乡土诗的盛行，并不等于其他观念的消失。其他观念只是处于一种潮涨潮落的状态，有时休眠，有时冒现。它们之间有可能平行前行，有时也会交叉与碰撞。这种状态我们从西川、陈东东在1987年就

提出“知识分子写作”观念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发展、汪国真的市民通俗诗、于坚的《0档案》写作、伊沙后口语诗观的出现等等现象中来得到求证。一般认为，除了“汪国真诗歌现象”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之外，其他诗歌观念的潮流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对诗歌的发展来说都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诗人从纯粹写诗到跳出来搞评论，也即除写诗外还对自己、诗歌本身、时代发出个人的声音，这似乎已隐含了某种征兆。那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感性向90年代的知性过渡，其他的说法还有，从集体写作到个人写作转变，从抒情向叙事转变，等等。只是诗人们的智慧抒发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却恰好与中国的政治环境有关。在这个契机之后，中国的诗歌界果然有了一些改观，此契机如同“惊蛰”，让诗歌慢慢从几年的冬眠中苏醒。不过，诗人们苏醒后发现这个世界与几年前的世界竟然是如此的不同，他们不再是社会思想文化醒目的标志，他们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大浪潮中也见证了文化转型的事实。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针对1989年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疑虑，他重申深化改革并总结了之前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终于认定“发展才是硬道理”<sup>[5]</sup>。全面发展市场经济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中国既定的方向，这就为一时“噤若寒蝉”的中国思想界突然松了绑。这个历史事件成为20世纪90年代真正的开端，也可视作20世纪90年代诗歌在初期的历史背景之一。1993年开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展开的，这一讨论是1992年后中国整个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开始松动的序幕。而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中国诗歌界也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知识分子写作”观念也在1993年被正式提出与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重要诗歌观念的提出与促延，与民刊关系甚大。这些民刊有《倾向》《九十年代》《反对》《现代汉诗》《南方诗志》等。许多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观念，比如“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精神”“个人写作”“中年写作”“日常性”“叙事”“及物”“综合”，等等，都由这些民刊提出、倡导、阐释并最终得到发展，而且不仅表现诗歌创作中，更重要的是直接进行理论上的命名和探索。

第二，新的诗歌观念的命名。早在1987年8月，陈东东、西川在第七届“青春诗会”上就提出“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但并没有具体地阐释。1993年，他在《答鲍夏兰、鲁索四问》一文中明确提出并解释“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他于同年写出长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篇极为重要的诗学文章，他一口气提出几个命题与概念并进行深入论述：本土性、中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其综合性是同时期其他任何诗学论文都无法相比的，他文中的每个概念都成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不断被阐释的对象，而且不断得到延伸发展，从而我们可以将之称为20世纪90年代诗歌观念最早的集合。

其实欧阳江河文中的概念大多不是由他第一个提出的，比如：“知识分子写作”由陈东东、西川在1987年“青春诗会”上提出：“中年写作”由肖开愚1989年夏在《大河》一篇题为《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文章中提出，但是，他是第一个对这些重要的概念进行综合论述的诗人。这种意义在于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诗人对诗歌观念高度的自觉性，从而加深了对诗人自身和对198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诗歌的认识，深刻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诗人观念中理性的上升，开辟了诗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不仅介入现实还介入诗学理论的先河。欧阳江河文中的“个人写作”概念作为一种观念，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统摄性的一个概念。有论者指出，此文“把‘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以及‘个人写作’这三个诗学范畴有意无意地混淆起来。事实上，欧阳江河的模糊表述反而明确地指出了这三者之间彼此叠合、纠葛不清的关联。”<sup>[6]</sup>这与其说是指出欧文的不足，还不如说成是其文的特点。

1992年《非非》复刊号上唯一的理论与头条文章就是周伦佑的《红色写作》。这可能是最早的一篇涉及诗歌要介入现实、反对高蹈的诗学文章。“红色写作”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诗歌观念的一个重要收获，它可能牵引了20世纪90年代诗歌观念中的介入现实、历史化、叙事性等一系列观念的浮现。该文副标题为：1992艺术宪章或非闲适诗歌原则。文章开篇即指出：“中国现代诗刚刚经历了一个白色写作时期”，文中多次明确提出反对“白色写作”，拒绝“闲适”“逃避”，提倡“口语化”“介入现

实”，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等等。

周伦佑的观念可以作为另一层面的代表，与欧阳江河的文章构成一种天然互补与相互响应的关系。如果欧阳江河代表“知识分子写作”一方，那么周伦佑则完全可以代表“民间写作”一方。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分化的迹象。他们的观念共同指向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历史，共同指向了1989年以来的诗歌现场，共同引领了诗歌今后的方向。可以说，他们的观念都是个人性的，都是充满“知识分子性”的，这其中分化的成分并不多，甚至没有。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观念命名还包括伊沙的“饿死诗人”的隐喻，于坚的“拒绝隐喻”。

第三，怀疑、质疑与危机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诗歌观念的“不和谐音”。1993年《文学评论》第3期头条发表郑敏3万字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对近一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及其与新诗创作的关系进行了思辨。该文迅即引发关于“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文学评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范钦林的《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与郑敏先生商榷》（1994年第2期）、郑敏的《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1994年第2期）、张颐武的《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的论争——一个九十年代文学的新命题》（1994年第4期）、许明的《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从郑敏、范钦林的争论说开去》（1994年第4期）、沉风、志忠的《跨世纪之交：文学的困惑与选择》（1994年第6期）。这次论争，历时一年半才告平息。

老诗人郑敏的质疑诗观，掀起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对新诗质疑与新诗危机论的浪潮。不时冒出的危机论使诗界不免产生一种动摇心态，这在客观上一方面促使诗歌界对新诗的历史作一次全面的回顾与反思，另一方面又不利于树立新诗发展的信心。1995年由周涛的《新诗十三问》引发的论争，把新诗的危机论推向高潮。其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建设没有很大关联，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如此，它并没影响20世纪90年代诗歌观念流变的全球。它最终只是其中的一个不和谐音。

## 二、发育、形成与分化的中后期

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些诗歌观念，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发生转变并得到很好的发育、延伸与发展，并最终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主导，比如“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诗歌创作是主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观念的诞生；而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很多种情况下，多元格局的诗歌成为诗歌界的现实而存在，并且反过来决定诗歌写作的流向。上文提到的一些观念有些刚刚诞生则走向消亡，比如新乡土诗与“汪国真诗歌现象”；有些概念出现后则显示出相当的活力，很快成熟，比如“知识分子写作”观念；有的观念在时代语境的变化之下而产生，而且与其他观念形成对立的情形，比如“民间写作”；有的观念则蕴含于其他的不同观念之中，与它们具有相当的公约性，或虽然更偏向于某种观念却又被其他观念认可并使用，比如叙事性、日常性、及物性、介入、历史化、口语化，等等。它们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并能体现出不同时期的特征。以上这些，都可以放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歌观念的发展历程中来考察，并且大致出现一个从发育、形成到分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大致有两种驱动力：一种来自诗人寻求自我超越而产生焦虑感的内驱力，一种来自外界变化所导致的时代语境变化而产生的外驱力。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两种驱动力表现得尤为明显。内驱力方面，于坚1994年的一席话相当有代表性。他说：“写作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活计，与语言搏斗是人类最壮丽的事业。我早年写作，一挥而就的时候多，自以为才华横溢，其实往往落入总体话语的陷阱。我现在写诗，有时一首诗改写多达十几遍，我是在不断誊抄改动的过程中，才逐渐把握住一个词最合适的位置。去年我写作《0档案》，这首长诗是我写作经历中最痛苦的经历，在现存的语言秩序与我创造的‘说法’之间，我陷入巨大的矛盾，我常体验到在庞大的总体话语包围中无法突围的绝望……”<sup>[8]</sup>“0档案”“总体话语”和“绝望”等一类的词语，充分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于坚观念转变时痛苦蜕变的过程。对于诗人的这种焦虑感，其实普遍反映在古今中外的诗人身上，可以说是“影响的焦虑”的直接后果。只是在中国的1989年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这个过程尤其特殊，所以他的这种焦虑感也就凸显出更为独特的意义。他的这种焦虑感其实也体现在其他诗人的身上，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尤为普遍。但是中国社会在向 20 世纪末推进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环境出现了极大的变化，诗人群体自身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最后导致了诗歌观念的分化，甚至是世纪末的冲突。

外驱力不仅促使那个时代整体的诗歌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也快速推动了诗人内部的分化。20 世纪 90 年代初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在经历了精神的涅槃后，在诗歌上确实有不少的建树，而且迅速成为诗坛的掌控者。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冲击，社会迅速进入晚报文化与银行利息的时代，于是启蒙主义自我瓦解，在这种背景之下，社会整体的文化结构进行了一次大洗牌。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的身份发生了或明或暗的变化。1989 年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他们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朦胧诗诗人们的处境基本一致，也就是他们与时代、政治之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换句话说，正是诗人们与时代、政治的紧张关系才造就了一代朦胧诗人与“知识分子写作”诗人。朦胧诗人被第三代诗人“PASS”，并不是他们与时代的关系缓和了，而是主要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开始兴起、“影响的焦虑”与诗歌命名的狂欢等一些因素所导致。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写作”开始失效，则是由于他们与时代、政治的紧张关系消失了，而且大多数成为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既得利益获得者。有的诗人走出国门，在国外讨到不少好处，拿到大笔外币，求得职位，并且可以在国外安居，只是他们仍舍不得国内的资源与成名记忆，从而穿梭往来于国外与国内之间，有了海外归来的光环，从而成为“国际诗人”。有的诗人以前期的诗学评论作为基础进入学院，从一个诗人摇身一变而成为学院派诗人兼学者，从而拥有诗坛话语权与撰写文学史的特权，俨然成为官方与主流的代言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开始了他们诗歌经典化的进程，文学史的编写，权威诗歌选本的编选，对为数不多的诗人的集中、跟踪式研究，等等，似乎诗歌也处于一个注重商品品牌的年代。如此一来，“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写作也逐渐中产阶级化，体现在诗歌文本中的就是批判性减弱，职业性增强，悲剧意识淡化，表现自恋的、自我的、内心放大诸如此类观念倾向的增强。以上原因导致了“知识分子写作”日益圈子化和失去亲和力。

与此同时，以口语诗、平民化倾向明显的“民间写作”越来越反感“知识分子写作”的做派。“民间写作”的知识分子性在不断上升。随着“知识分子写作”精神的逐步退隐，中国的经济与国力也日益增强，国际地位稳步上升。“民间写作”观念适时的上升趋势，也就更符合本土化与民族主义在社会变化中的需求，从而使“民间写作”观念不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性”当中剥离，而且也加快了与“知识分子写作”观念分化的速度。下面粗略谈谈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最主要诗歌观念发育、形成与分化的具体表现。

关于“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知识分子写作”观念从最初提出到再次提出与确立，其中有很清晰的线索，这与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三人有着直接的联系。只是它再到不断深化、不同阐释甚至发生偏移的过程，则显得有些含糊与混乱，这个时期正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及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与诗评家都有各自的阐释。比如程光炜的《诗歌的当下境况与个人化写作》（1995）、《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1997）、《不知所终的旅行——九十年代诗歌综论》（1997）、《我以为的 90 年代诗歌》（1998），等等。又如王家新的《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关于当代诗学》（1996）、《从炼金术到化学：当代诗学的话语转型问题》（1996）、《对话：在诗与历史之间》（1996）、《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1997），等等。再如西川的《诗歌炼金术》（1994）、《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1995）、《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1997）、《90 年代与我》（1997），等等。以上几个人的例子就已然说明问题。到“盘峰论争”发生后，则掀起对其进行全面阐释的高峰，之后则渐趋平静，不断弱化，以至无人提及。不过，从以上诗学文章发表的时间来看，大多集中在 1995 年之后，这个时间段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写作”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加速了自己的命名。过盈而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与他们对立的“民间写作”也开始加速了针锋相对的命名与阐释，从而加速了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观念内部分化的进程。

关于“民间写作”观念。一般认为，这是一种“平民化”的诗歌观念。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第

三代诗歌对朦胧诗的反动来看，就已呈现出平民化与贵族化的分化倾向。如果说朦胧诗是现代的、贵族的，那么第三代诗歌则是貌似是后现代的、平民的。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语境已大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但对比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贵族化）与“民间写作”（平民化）两种倾向的分化情形，历史却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只是不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是群体性的，而20世纪90年代则相当个人化。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言辞确凿，概念明确而清晰，“民间写作”观念的正式形成却是在世纪末的“盘峰论争”之后。但这并不等于说之前它不存在，只是“民间写作”观念呈现一种分散状态，而且命名也没那么集中和统一。对“民间写作”观念的阐释，论争发生之前的代表人物当推周伦佑和于坚。周伦佑的代表文章有《红色写作》（1992）、《当代诗歌：跨越年代的言说》（1993）、《拒绝的姿态》（1993），当然他的阐释只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而进行“非非主义”的言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写作”观念的直接阐述，而且他的文章都是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能够代表直接与“知识分子写作”观念对抗，并且其言论发表在论争发生之前的主要有于坚、沈奇、谢有顺等人。于坚自1982年就开始记录他诗学观念的随感，将之集中于《棕皮手记》并不断发表，他平民化、口语化的“民间写作”立场的观点几乎可以从中全部找到。他的其他主要文章有：《诗人于坚自述》（1994）、《传统、隐喻与其他》（1995）、《从“隐喻”后退——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之我见》（1997）、《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1998）、《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1998），等等。于坚一系列的诗学主张，加上韩东80年代即已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以及周伦佑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理论，还有广大民刊所提供的观念的助阵，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的背景烘托，这一切实际上都为“民间写作”概念的最终明确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一种喷薄欲出的态势。论争发生后，他对“民间写作”才有针对性极强的阐释。对“知识分子写作”一边倒的优势理论阐述与“权威”的发表，持“民间写作”的一方极为不适，明确表示对抗的文章除了于坚的之外，还有论争发生前不久发表的沈奇的《秋后算帐——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谢有顺的《内在的诗歌真相》《诗歌与什么相关》，等等。“民间写作”的言论，迅速激起“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反击。包括王家新、唐晓渡、孙文波、臧棣、西渡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纷纷撰文，对之表示不满。从而分野渐趋白热化，直到“盘峰论争”的发生。

在双方观念发育、形成与分化的过程中，还有些具体的观念变化十分引人注目。其一是语言资源上，“知识分子写作”越来越多地使用西方的语言资源，而“民间”一方则强调本土口语或方言。其二是内容上，前者同样更多地使用西方思想资源，而后者则强调母语的原创性。这同样还表现在对历史化与现实的不同理解上，前者提倡一种曲折的介入方式，更多地以个人的体验来面对现实的诸多无奈，是一种升华式的拒绝。而后者则强调一种日常性生活的形式来介入。其三是前者越来越强调技术性，而后者则追求一种平民化的口语。其四是前者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喜剧与挽歌。而后者则体现为底层式的悲悯与对现世的直接关怀。总而言之，他们各自的观念是动态发展与变化的，双方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并逐步形成各自的观念形态，却为了同一个目标，最终分道而行之。这一切表现在他们诗歌中的语言策略的变化上，他们都充满了“个人性写作”而坚持自己观念的特质，这可能是双方能够相互对抗的动力所在，分化中又体现出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品性。

### 三、冲突与走向多元的新世纪

“盘峰论争”之前，先是多种观念的生发，随着社会与文化语境的变迁，逐渐演化为两大观念的对立，并导致最后的火并。对于论争，有论者认为是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其实并不尽然。至少，双方为了求得自己的合法地位而极力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两种观念发展的历史来说，是一次大盘点、大清理。虽然其中存在不少意气之词，但毕竟其中也不乏学理探求，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两种观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中后期的演变史，其实已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冲突后的结果与走向。从当下来回顾这场论争，它确实对日后诗歌观念的走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为再次走向多元化的格局打下了基础。

1999年“盘峰论争”之后，第一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继续论战，一年后才渐趋平息，在这过程中，“知识分子写作”的声音已呈弱化趋势；第二是“民间写作”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出现新的

裂变；第三是“第三条道路”“70后”“下半身”“中间代”、网络诗歌等观念相继登场，发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声音。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分化的演变史就成为必要的考察对象。

“民间写作”内部出现分化始于“盘峰论争”之后的另外两次“诗会”。其一是1999年11月12-14日，由《诗探索》编辑部、《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北京昌平龙脉宾馆联合主办的“’99中国龙脉诗会”。其二是2000年8月18-21日，在南岳衡山举行“九十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即“衡山诗会”。这两次诗会“知识分子写作”代表人物悉数缺席，这就为“民间写作”一方内部的分化提供了可能。正如伊沙所言：“有一种失去对手后的‘无边的空虚’。”<sup>[8]</sup>失去了对手，那么矛头就应该指向自己一方了，这种“后现代”的态度从客观上促成了“民间写作”一方对自身的反思。也正是在这次诗会上，收获了另一种共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外，诗坛事实上存在着大量显在或潜在的‘另类写作者’”。<sup>[9]</sup>这就又为多元观念的即将诞生定下了基调，并默认它们存在的合理性。曾经以一篇《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让诗界大为震惊的“大学生”沈浩波，他几乎彻底否定了“民间写作”已成名的诗人，并指出之前“民间写作”在相当程度上是无效的。这种否定一切的勇气似乎也反映出诗歌艺术的独立、严肃与创新的品质，同时也可作为“盘峰论争”之后到新世纪诗歌观念再次分化的一个显目的标志。“民间写作”内部的分化还可以“沈韩之争”作为例子以观其特征与诗歌观念的分歧态势。

“沈韩之争”发生于2001年初。沈指“下半身写作”倡导者沈浩波，韩指“前辈”诗人韩东。从他们二人之间的争吵开始发展成为以他们各自为代表的两派之争。沈浩波在2000年的“衡山诗会”上已对韩东提出批评，他又在《诗江湖》网站上说：“我知道我在衡山的发言让你感到疼了”。后来韩在2001年第1期的《作家》杂志上发文表达了对以沈为代表的先锋诗学的不屑，他说：“比如我最近听说一位新的诗坛权威发明了如下公式：文学=先锋，先锋=反抒情。并且声称自己要‘先锋到死’。先不说‘先锋到死’有多么煽情，以上公式也太白痴了一些，而且误人。”之后，他们以及他们各自的阵营就在《诗江湖》网站上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论争。

这又是一场从“诗学交锋”转变到“意气之争”的例子。韩东质疑沈浩波的先锋性，并认为其并非艺术上的个性。沈浩波则认为正是由于韩缺乏了先锋性才致使他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失效，具体表现在“才子式的小吟咏”“柔弱的小情调”“小悲悯小抒情”等方面。沈、韩双方的盟友相继介入到《诗江湖》《橡皮》《唐》等诗歌网站的论争中，最终演变成同一诗歌阵营内部的“话语权力”之争。支持韩东的以“《他们》派”为主，支持沈浩波的以“北师大帮”为主。此次论争最终以韩东单方面撤出结束。这次论争在观念上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比如：杨黎的“民间和伪民间”之说、话语权力之说、沈浩波的“语言与身体”之说，等等。但意义不能遮蔽丑陋的一面，谭五昌认为：“‘沈韩之争’充分暴露了不少‘民间’诗人（尤其是年轻的诗人）身上所存在的严重的‘江湖习气’及对待诗歌艺术的浮躁与功利心态。”<sup>[10]</sup>这种“江湖习气”与网络的流行沆瀣一气，又充分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反文化诗与20世纪90年代以伊沙为主的后现代口语诗的粗鄙性，在诗歌观念上产生了另一种含混不清的又带有狂欢性质的新世纪气象。

“第三条道路”诗歌观念的产生与“龙脉诗会”有关，代表人物包括车前子、树才、莫非、杨晓民、谯达摩等。诗歌界针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提出了不仅仅是折中的“第三写作”或“单独者”的写作。这类写作是对20世纪90年代初即已提出的“个人写作”的充分延伸发展。谯达摩、莫非、树才等人在“龙脉诗会”之后编选《九人诗选》，并明确提出“第三条道路”诗歌观念，“盘峰论争”后中国当代诗歌写作与观念多元化由此开始。“第三条道路”也被认作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出现的第一个诗歌流派。

“70后诗歌运动”是以代际来命名的诗歌现象，论者谭五昌与诗人黄礼孩都曾考察这一运动产生的过程。第一，序幕。1998年底，北京“蓝色老虎”现代诗歌沙龙在清华大学举办“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群体之声”活动。但据“70后”的“吹号手”黄礼孩说，“‘70后写作’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1996年陈卫在南京创办的民刊《黑蓝》。”<sup>[11]</sup>第二，自觉运作。1999年5月，广东青年诗人潘漠子、安石榴等人策划的“1999年中国70后诗歌版图”在民间诗报《外遇》上推出。陕西青年诗人黄海、王琪在西安连续推出

几期《七十年代》诗报。1999年12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70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齐聚北大，举办“生于七十年代——中国诗歌新锐作品朗诵会”，“70后诗歌运动”遂成声势。第三，标志性的确立。2001年1月，广东青年诗人黄礼孩在广州策划、主编民刊《诗歌与人》，刊物以“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为主旨，先后推出大量“70后”诗人的诗歌作品。2001年6月，黄礼孩编选《70后诗人诗选》，这部带有总结性质的诗选使“70后”诗人在诗坛终于拥有了一定的地位。谭五昌认为，“‘70后’诗歌运动无疑可看作‘一代’诗人在承受着‘前辈’诗人‘影响的焦虑’和社会文化思潮对于诗歌的‘冷漠’所构成的‘双重压抑’中而进行的一次强力‘反弹’与‘突围’，他们力图以主动‘建构’历史的方式为自己争得应有的诗歌地位，进而希图获得社会的关注与认可。”<sup>[12]</sup>

“70后”“不可能共用一种诗歌美学”“希望在求新求异的方向上一路挺进”<sup>[13]</sup>，这可能就是“70后”的诗歌观念。安石榴的观点很具代表性，他对“70后”的写作心理直接明了地说：“你们不给我们位置，我们坐自己的位置；你们不给我们历史，我们写自己的历史。”<sup>[14]</sup>

沈浩波概括“70后”产生的背景时说：“在‘知识分子’和学院写作横行的10年，是中国先锋诗歌停滞的10年，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那些生于70年代前期的诗歌爱好者，用朵渔的话说，那是被‘吓破了胆’的一代，先被海子的‘麦地狂潮’给蹂躏了一把，后被知识分子的‘修辞学’和‘考据学’给唬弄了一把，就成了那个鸟样子了。”<sup>[15]</sup>作为“70后”诗人代表的沈浩波，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下才推出了他“下半身”诗歌观念的。

“下半身”观念是在“70后”诗歌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以2000年7月沈浩波推出《下半身》杂志为标志，其目的是要给“70后”重新洗牌（朵渔语）。值得注意的是，“下半身”观念的兴起和形成一股潮流与网络关系密切，包括“诗江湖”“诗生活”“唐”“橡皮”等在内的诗歌网站直接使“下半身”成为中国一时显要的诗歌观念。沈浩波说：“《下半身》的创刊，才真正预示着‘70后’诗人们真正成为中国先锋诗歌的中流砥柱”“《下半身》的一举成名，离不开各诗歌网络网站的兴起……”<sup>[16]</sup>

沈浩波在《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中开宗明义就指出这种写作的意义在于：“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他的“上半身”包括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等等。与之相对的，他的提倡只是“下半身”，因为“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这些都是“一种坚决的形而下的状态”，包括贴肉状态、肉体的在场感、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等等。他要担当一种反文化的正面角色，认为只有肉体本身才能“回到了本质”。总之归为一句话：“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sup>[17]</sup>

2001年10月，安琪、黄礼孩为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编选了一本作品集《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安琪在序言中提出“中间代”的概念。于是，“中间代”就在“盘峰论争”之后、“70后”诗人崛起之后而诞生了。一方面，60年代出生的诗人好多都属于第三代诗人，而且不少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成名；另一方面，“60后”却后于“70后”而出世，而且还冠名为“中间代”，这未免显得奇怪。从这本诗选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是重要的，只是对这个命名引来不少争议，“是一个勉强的诗歌概念”<sup>[18]</sup>“一个策划的诗歌伪命名”<sup>[19]</sup>等类似的说法时常冒现。其中争议不无道理。在中国新诗史上，每一个诗歌潮流的命名都必有某种具体而实在的诗学主张提出，拿“70后”来说，正因沈浩波提出了“下半身”观念，才使“70后”诗歌截然有别于其他诗歌命名。“中间代”提出过什么诗学观念呢？应该是没有具体的诗学主张的，所以它的命名是“暧昧”的。“中间代”如果作为一个代际概念，那么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甚至是早前的“第三代诗人”，或者之后的“第三条道路”的诗人中，都有很多60年代出生的，比如“知识分子写作”诗人臧棣、西渡、陈东东等，不在人世的海子、骆一禾，“民间写作”的伊沙、韩东，不便分类的张枣、陆忆敏、唐亚平，等等，他们都属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如果说以上所提诗人是被强拉入这个阵营的话，那么“中间代”的命名就有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但还没成名的诗人立传、入史的嫌疑了。中国诗歌史上，命名层出不穷。“盘峰论争”之后，又有“70后”与“下半身”的冒现，“命名疲乏症”（程光炜《“中间代”一说》，《诗歌月刊》2002年第8期）成为一种普

遍存在。那么，“中间代”的出现并非如那本诗选编者所言：“中间代”是时候了。

尽管“中间代”颇受争议，但自面世后，还是为诗坛带来一些生气。其一是以其命名而推出了不少优秀的诗歌。其二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演变史上，毕竟还是提出了一些虽然不够统一集中但却有一定建设性的诗学主张。这些诗歌观念零散地出现，不能作为“中间代”的美学观念，一些较知名的有：臧棣的“诗歌是一种慢”、伊沙的“饿死诗人”与“结结巴巴”的后现代口语、古马的“用诗歌捍卫生命”、安琪的“我只对不完美感感兴趣”、汗漫的“诗人与鸟相似”、沈苇的“在瞬间逗留”，等等。这些观念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有些也同时属于之前一些潮流的既有观念，在此只是又再次被限定进“中间代”的观念范畴，所以这些观念的产生与“中间代”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由上观之，1999年“盘峰论争”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诗歌观念呈现多元分化的格局。这个局面更多时候是通过一系列诗歌论争事件来体现的。新世纪以来，诗歌论争发生的频率超过新诗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且由于网络的普及发生得也更为容易，诗歌现场与诗歌观念也就在这种风雨飘摇之中显得更为混杂、无序而难以把握。“盘峰论争”之后又发生了以下论争：沈韩之争（2001）、“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的论争（2001-2008）、关于“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2002-2008）、“关于现今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问题”的论争（2006）、对20世纪90年代诗歌评价问题的论争（2006）、赵丽华“梨花体”诗歌事件的论争（2006），等等，这其中还不包括很多网络上发生的诗歌论争。这一切现象表面看起来，都似乎有发生的特定背景与事件支撑，但总的来看，大多数仍可视为“盘峰论争”在某一方面的延续。

总而言之，这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进行了整体性的阐述，也即对1989年以来不同时期观念流变的过程，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由来和争锋，也包括“盘峰论争”之后多元走向的格局进行了大致溯源式的探析。其中的复杂性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欲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作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只有将所涉观念置于具体历史时期进行考察，并进一步阐释流变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才能体悟中国当代诗歌特定的历史阶段性与前行的曲折性。

#### 参考文献：

- [1]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89-90.
- [2] 西川.怀念(代序二)[M]//西川.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1.
- [3] 燎原.重返“家园”与新古典主义[J].星星,1998(11).
- [4] 袁忠岳.现代“游子”的梦幻——也谈新乡土诗[J].星星,1992(9).
- [5]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7.
- [6] 谭五昌.北京:20世纪90年代“个人写作”诗学探析[J].文艺争鸣,2009(4).
- [7] 于坚.诗人于坚自述[J].作家,1994(2).
- [8][9] 孙基林.世纪末诗学论争在继续——‘99中国龙脉诗会综述[J].诗探索,1999(4).
- [10] 谭五昌.世纪之交的中国新诗状况:1999-2002[J].诗探索,2003(3-4).
- [11] 黄礼孩.一个时代的诗歌演义——关于“70后”诗歌状况的始末[J].诗选刊,2001(7).
- [12] 谭五昌.世纪之交的中国新诗状况:1999-2002[J].诗探索,2003(3-4).
- [13] 黄礼孩.一个时代的诗歌演义——关于“70后”诗歌状况的始末[J].诗选刊,2001(7).
- [14] 黄礼孩.一个时代的诗歌演义[M]//70后诗人诗选.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 [15][16] 沈浩波.诗歌的“70后”与我[J].诗选刊,2001(7).
- [17] 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M]//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544-547.
- [18] 燎原.为自己的历史命名——关于“中间代”的随想[J].诗歌月刊,2002(8).
- [19] 梁艳萍.中间代:一个策划的诗歌伪命名[J].文艺争鸣,2002(6).

[责任编辑:庆 来]

## Ancient Middle East and Chinese Culture

CHANG Xiao-b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133, China)

**Abstract:** How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rted is still a puzzle to be solved. Ancient Middle East and China which were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were two centers of human civilizations. They showed unexpected various tacit agreements. Based on the life story of Hou Ji, the eldest-son-inheritance system of ancient Middle East and China, prime minister system of both China and ancient Egypt,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al veins of the two civilization centers so as to view the “tacit agreement” between these two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ancient civilization; pre-Qin history; life story of Hou Ji; eldest-son-inheritance system; Vizier

## The Developmental Change of the Chinese Poetry Concept since 1990s

ZHOU H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This writer of this article makes a holistic dissertation of the poetry concept since 1990s, as well as a source-tracing exploration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 concept in different periods, especially the origin and argument about “intellectual writing” and “folk writing”, as well as the diversified pattern after the “Panfeng Argument”.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al change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of break, depression, and regrowth, the mid-and-late stage of development, formation and division and the new century of diversification.

**Key words:** since 1990s; poetry concept; “Panfeng Argument”; developmental change

## From Competition in Language to Competition in Thought —Argument about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nd Poetry

TAN Jian-cheng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is a route not only to social justice, but also to the truth itself.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issue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state education is to seek the entrance to justice so as to realize its ideal and value of guiding social practice. The argument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m in language was not simply an optional competition about education content, but a realistic requirement of the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of philosophy and justi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st conception and unjust language tradition is anti-thetic and competitive, even militant, as justice itself is a weapon of thought against all injustice.

**Key words:** justice; education; classical philosophy